

奴才的“创造性”

奴才这个词,在清朝用得特别多。满人下级见上级,尤其是见皇帝,必定自称奴才。乾隆认为,清朝的臣,是奴才的奴才,无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,跟大户人家看门、打杂、跟班伺候人的主儿,没有本质区别。按常理,这样的奴才谈不上创造性。

但在听话和顺从方面,清朝的奴才们还是有创意的。比如说,过去人们顺着皇帝说话的朝臣,有三旨相公(听旨、领旨、遵旨)、模棱相公,而清朝,则推陈出新,上了一个新境界。做过乾隆、嘉庆和道光三朝红人的曹振鏞曹大人,死的时候,被道光称为“实心任事”的朝廷第一号大学士,其做官的心诀,是六个字:多磕头,少说话。那个时代,很多后进的朝臣,在私下写笔记的时候,都免不了提及赏识提拔他们的老师前辈。最感恩的话,无非是说,老师如何叮嘱他们,上朝的时候,裤腿上要缝上块皮子,最好装点棉花,否则跪久了,膝盖要生病的。当然,更有人的人,还会特意请教一些资深太监,讨教他们如何头磕得响,但又不十分痛的方法,以增进多磕头的边际效应。深得曹振鏞大人心法的,是位满人。此人叫全庆,是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元老。为官60年,活了82岁,最后躬养体仁阁大学士、太子少保,可谓位极人臣,全福全寿。此老不仅见皇帝多磕头,而且回到家自己没事也

磕。风雨无阻,每日磕头120次,起来跪倒40次。就像打太极拳,做体操一样。据说,这就是此老的长寿秘诀。他的学生汉人翁同龢,在做官做到罢官回家之后,深感老师的功夫深厚,于是在家待着,每天入夜必定在房间里三跪九叩数次,才上床睡觉。最终,得以保住了自家的首级,没有身首异处。

做奴才才做得心服口服,自我总结经验,私相授受,然后再把磕头这种奴才仪式转变成健身体操,终于做到体健长寿,这实在也算是一种创造。这样的创造,当然没办法让大清走出困境,更休谈富国强兵,但是在上面的皇帝或者太后,都要受用。无论说什么,都有人答应“喳”,无论做什么,都有人赞圣明,一呼百诺,威风凛凛。大权在握,图的不就是这个吗?可是,真到了有事的时候,这些奴才,除了徇主意之外,半点正经主意也没有,眼睁睁把皇帝太后带到沟里去。

所以,将下属都变成奴才,自我感觉是不错。但是不能碰上事,也不能有大事要办,否则吃瘪是现成的。只是,天下做领导的,没几个在乎做事的,更不打算做什么大事。只消大家向上一级一级地下跪,向下一级一级地吆五喝六,天下太平。有事怎么办?再说吧。

(摘自新星出版社《不曾苟且》张鸣/文)

如果我当大官儿,我要求管教育、创意产业和外交。教育太重要了,记得大概十年前,美国的移动通信普及率还不如中国,转眼就超过了我们。专家预测智慧移动设备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在数码时代,信息会像我窗外的台风一样,横扫。面对这样的未来,中国的教育制度必须改革,因为如果信息迎面袭来,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。而中国的教育制度的缺陷就是没有启发学生自己的思考能力。愚民容易统治,但是不容易管理。

教育不改革,中国还会第二次落后,会浪费掉现在的机会。我个人认为,教育改革很简单,就是引进竞争机制,允许私立学校办学;编写一些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教材。自己没编出来之前就翻译,有选择地引进。如果我们造鞋、造玩具的机器可以大批引进,为什么不能引进造人才的机制?

创意产业的问题就是建设中国品牌的问题,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问题。微博上一个网友发私信问,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做一个个像样的服装品牌,只有服装制造和销售市场。我认为创意产业的特征是从想法开始,不是从资本开始,所以往往是从小到大,不像国企,个个都是大象的块头。可是在创意产

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,一种最深层的无力感,不是来自那种变化的多端,常常却是一些拒绝改变的力量。它让我们一再反思,关于进步,关于法治,我们到底走出了多远?

10月31日,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捕公判大会在山东曹县人民会堂举行,20人在大会上被公开逮捕,曹县法院随后对被告人进行宣判。根据当地官方的说法,2000余人参加了大会。这样的事情总是一再出现,早已到了令论者无语的地步。

禁止任何形式的游街示众,多年以来早已为法律三令五申。一个人永远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主权,即便罪人的身体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手段。这些观点早已成为共识。然而就是这种我们以为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权利底线或权力伦理,以为属于最基本的法治精神、最浅显的文明规则,曹县方面却仍旧一副惘然不知,依然我行我素的样子,让人不知今夕何夕。已经很难说,相关部门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佯装不

什么是公民?我相信不少人难以回答。我们这代人,吃毒草、喝狼奶长大,成年后,再用公民教育解毒,却未必能解干净,口中的语言、脑中的思维,常见毒素的残余,毒质寒冷的磷光,仍能一击致命。我们只能默默安慰——或者说欺骗——自己,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有所好转。

待我问侄子、侄女在小学的情况,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之丰、方法之富、器具之巧,的确远胜于我们贫乏的当年,不过,与我们一样悲哀的是,他们可以在十秒钟内算出“公民”的笔画,却依旧不知其中的内涵。何为公民?若依定义,“公民”可与“国民”通用。而今我们口中的公民,则另有所指,即与国民相对——如此,便不能替换为国民,因为从名义上讲,臣民也属国民,纵然从实质上讲,独裁者没有内政,奴隶没有祖国。相比“国民”,“公民”身上的政治色彩更加浓重,有时甚至被当做一个褒义词来指称,它的对立面,是臣民、愚民、暴民……

公民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。不过在今日中国,我们说公民,更侧重其与权利的亲密关系(如“公民权”之说风行一时),这背后的原由不难想见,我们的国民,一向是义务太重而权利太轻,且权利往往滞留于纸面而无法落到实处。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,必然从欠缺入手,更为重视权利的建构。这大抵可谓拨乱反正。对比可见:臣民毫无权利,愚民不知权利,暴民践踏权利,唯有公民,在实践并捍卫权利。

臣民的国度,呼唤英雄的拯救;公民的国度,只须普通人的耕耘。公民是凡夫俗子,不是英雄侠士。只可惜,在我们生存的年代,常常将公民误作英雄,这是我们的悲剧,更是公民的悲剧——这个时代太缺公民了,以至出现一个勇于维权的公民,不是被视为异端,就是被视为神话。须知,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民意识的培植,借用一句流行语来讲:不是靠一帮勇敢的人,去触碰勇气的上限,而是靠一帮普通的人,来抬高勇气的下限。

(摘自《中国经营报》11.3 羽戈/文)

知,或者是根本视法律如无物,但无论怎样它的确让我们看到,一个愈来愈进步的法治社会背景下,一种始终不曾改变的权力僵化。无论执法者成为法治的障碍,那么一个前提必须是执法者更能成为法治精神的践行者。一些事实却表明,很多公权力者并没有主动适应浩浩汤汤的变革,因循守旧,抱残守缺。比如不久前,鉴于不少地方事业单位发布的招聘公告涉嫌歧视,反歧视公益人士郭彬公开举报至各省相关部门,然而收到的回答竟然是,“因为往年都是如此的。”这个回答,将一种拒绝适应变化的僵硬或固执尽显无遗。

还比如知名律师李庄日前在微博上表示:近几个月,应一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邀请奔走于各地,接触了大量司法案例,同时,也多与当地公检法人员进行广泛交流,震惊的是,一些执法者,竟然不知明年1月1日即将实施新《刑法》。这种情形令李庄直呼“可悲”。权利时代,法治隆隆前行,相关公权部门却不为所动,岂不悲乎!

显然我不太认同,一些手握权柄者真的闭目塞听。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,一些早已为法治理念所抛弃的那些做法或举措,更能体现权力可以不受节制、为所欲为的本能诉求。所以一切的根源,仍在于这样一个现实问题:权力的边界何在,谁才能真正地约束权力?

这样的事例每出现一次,总会不可避免地让人调低对于法治社会的信心,对于依法执法的期待,而最终会让人误以为,法律与执行,法治与社会,从来都是两张皮。

(摘自《华商报》11.3 杨耕身/文)

何为公民

一张传世照片是怎样“回”到中国的

我在外交部工作了34年,特别爱好摄影。在我看过的无数照片中,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焦·洛蒂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拍摄的这张传世之作,给我印象最深。当时,我一直想知道这张照片是怎么拍摄的,又是怎么流传的,经历过哪些有趣的故事,现在可以说,我的这些愿望全实现了。

照片记录了周恩来总理晚年典型瞬间

1973年,意大利《时代周刊》记者焦尔焦·洛蒂先生为总理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一张半身像,整个画面为暖色调,在深深的背景下,总理穿着灰色的中山装,侧身背倚沙发,左臂扶在沙发上,右臂微微靠在胸前,消瘦的面容,双目深邃而坚毅地注视着前方。若干年后,在洛蒂先生再次访华时,邓颖超大姐当面对他说,“这是总理生平中最好的一张照片”。

撒了一个大谎终于拍成一张经典照片

据焦尔焦·洛蒂回忆:1973年1月6日,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塞佩·梅迪奇率团访华,作为《时代周刊》的摄影记者他也随团来访。一天,他得知当天晚上周总理要接见意大利代表团,便找到意大利驻华大使,执意要去人民大会堂。大使告诉他,“所有代表团的记者都不允许为周恩来照相,你可以,但不能拍照,你答应我的这个要求,才能让你去。”洛蒂答应了大使要求,但出于职业习惯,还是带上了照相机并且琢磨着为周总理拍照片。代表团成员和记者们三四十人排着队,轮到了一个与周总理握手。为了拍照,洛蒂特意排到了队尾。等到他,他谦恭地用法语对总理说:“尊敬的总理阁下,我来时撒了个大谎,答应不给您拍照,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见到您,不能不给您拍照,因此,请您允许。”周总理微微地点头认可。洛蒂马



次按下了快门。

偷梁换柱骗警卫“没收”假胶卷

洛蒂拍完照片后就一直在想:怎么做才能把底片保留下来呢?突然,他眼睛一亮,快速地把相机放在桌子底下,取出底片,又迅速装上一卷新胶卷,并按了两下快门。不一会儿,一个警卫人员来到他面前,很有礼貌地问他:“您是洛蒂先生吗?”洛蒂答:“是”。警卫对他说,“您给周总理拍了照片,违反了我们有规定,请您立刻把底片交出来。”洛蒂演技似的向警卫人员“苦苦哀求”,然后假装“很不情愿”地当着警卫人员的面把相机打开,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曝光后,“十分沮丧”地交给了对方。

照片被王传斌参赞藏在箱子里带回国

周总理这张传世之作是由我国前驻意大利政务参赞王传斌带回国的。在王老生前写就的《跨世纪的回忆》中,详细地谈到了这张照片从意大利带回国内的来龙去脉。书里说,这张照片冲洗出来后,意大利《时代周刊》格外重视,将其刊登于该杂志封面,其他报刊多予转载。1974年

“文革”的时候,我混在学校一派组织的宣传组里,每日的工作就是出版油印小报。刻蜡版的手艺,几乎被我们玩到家了。到了插队的时候,还惦记着到乡下去宣传毛泽东思想,把学校的油印机、钢板、铁笔、蜡纸卷了全套,偷偷打入了行李,带到陕北的村里。但一直没派上用场。

插队到第三年,知青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农村,有上学的,有被招了工的,剩下的可都着了急,纷纷自找门路。很多人想到了办病退。人们为了能够开出病退证明,也是八仙过海,想尽了手段。比如量体温之前,先灌一肚

寸,就开始仿刻。票面仿制并不难,无非就是几行字,图章得费点劲,把它照原样描下来,然后像刻宣传画那样一点点地刻,刻好了,取一团棉花,蘸上红印油,把蜡纸覆在票上,轻轻一擦,一枚逼真的章样就印上去了。

队里这时只剩了三个知青,大字他爸是右派,自然上学招工都没他的份儿。黄毛他妈在街道作坊糊纸盒,二强家也是无权无势。三人走投无路,就想起了“文革”时我们玩过的这点技巧。假造病退证明不是小事。闹不好甭说北京回不成,还有可能被抓起来。三个人击掌为誓,要守口如瓶,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。然后就进行了分工,大字好了,负责刻印和填写证明,黄毛手快,

派他到县医院去偷单子。二强的同学已办好了证明,让他去借来一用。一切准备齐全,三个人接下来要做的事,就是逃病。那时我们每个知青户都有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,几个人翻了半晌,各自选了一个。二强选的是腰椎间盘突出,大字文气点,选的病也不一般,叫房性心颤。黄毛开始选的是痔疮,众人嫌恶心,给骂了回去,又改成了风湿性关节炎。然后从书上的症状里挑上几条,由大字仿着医生们惯用的龙飞凤舞的笔调往表上填。在蜡纸上刻那枚章子,花了大字几乎一天的时间,毕竟三年没刻,手硬的不行,前两个都刻坏了,到第三个才找到了感觉,终于成功。三张证明制作完毕,大字把那张蜡纸,一把火烧了。

可能是天意怜幽草吧,他们一路过关斩将,竟把事儿顺利地办成了。我想管事的人心里也清楚,那么多的知青办病退,有几个是真的,何必那么较真。这假证明未必做得天衣无缝,还是人家手下留情,想积德罢了。

英雄不问出处,如今大字在美国,念完了博士当教授。二强自己开公司当老总,听说买卖做得还不错。黄毛在某部门工作,已混上处长了。不过这三提起当年事,还是心有余悸,轻松不起来,因为二强现在在时时腰疼,黄毛腿脚也不利索,大字呢,随身带着硝酸甘油片。凡事皆有因有果,谁知道这不是不是假证明惹出的祸呢。

(摘自《崖畔上开花》陈幼民/著)

上请总理坐在沙发上,为总理拍了一张,但他发现,无论角度还是总理姿势,都不十分理想。就在那里,运气来了,总理的秘书在大厅门口叫了总理一声,似乎要对总理说什么。总理上身微微向左转动,双眼向秘书望去。洛蒂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瞬间,第二次按下了快门。

北京海关时,海关人员照例地问:箱子有无违禁物品?有无为他人携带的物品?我说:我们在外奉公守法,从未买过什么违禁品,只是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些生活必需品,按照规定不会为他人携带什么物品。就这样得以顺利过关。回到家中赶快开箱取出衣物,看到周总理的照片很平整,无任何褶皱,全家人都非常高兴,一致同意将照片装在镜框里挂起来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,我老战友的孩子李尚志到家里来,看到这张周总理的照片非常惊喜,那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,回去后将周总理照片的事报告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,他随即决定请李尚志到我家中取走照片,翻拍后制版印刷。从此,这张周总理的照片很快传播到全国,出现在各地的书店里,悬挂在家家户户,各种报刊杂志也予以刊登。”

(摘自《北京晚报》10.29 关宗山/文)

“打倒老三”

标语从来都是在广大农村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最常见的方法。那年有一个标语赫然醒目:“打倒老三!”我就是老三。所以,生产队不给我上户口,分粮食。

奶奶还经常一个人跑到生产队的打粮场偷偷抹泪,埋怨老天为啥这么对她?为啥就不给她个孙子呢?襁褓中的我,也许已经知道家里人不欢迎自己,没过几天,我就生病了。

奶奶的善良在村里是出了名的,家里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要打发讨饭的;谁家有了矛盾了,奶奶就去帮人家调解。我一生病,奶奶慌了,赶紧求神保佑。

神告诉她:“你们都嫌她是丫头,那就降灾给她,把她收回去。”这下,奶奶吓坏了,哪舍得让我生病呢?奶奶就对神说:“我们不嫌弃丫头,就算有一群丫头我们也不会嫌弃的。”所以,奶奶给我起名叫群。没想到情急之下,奶奶对神的保证真成了现实。在我身后,妈妈又生了三个丫头,四妹、五妹和六妹。(摘自《当我从天安门前走过》徐庆群/著)

1971年11月7日上午,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,一些中国青年外交官参加完“十月革命”庆祝活动后回到使馆,在接待室小坐。正在大家热烈讨论时,随员彭剑华发现,正前方原来放置书架的墙面上,有一个白点。

彭剑华发现这个“白点”类似一个塑料吸管,露出墙面约一毫米。他用手一按,那吸管便被按入墙内,一撒手又弹出来。他将情况反映给大使赵毅。赵大使的第一反应,是使馆隔壁有人窃听,那个“吸管”是窃听探头,之所以露出墙面,是因为计算误差。

接下来,要考虑如何把窃听器装置取下来。一个周末,午夜时分,彭剑华和另外三个人,手持铁条、凿子、铁锤,摸黑进入接待室。还有几个人爬到楼顶上,观察使馆隔壁的动静。为了防止暴露,彭剑华他们紧闭门

窗,只开手电,一下接一下地凿墙壁。由于墙壁较硬,进度十分缓慢。这难免让人急得下重手,于是声音越来越大。行动暴露了。

凌晨一点,中国使馆周围来了几个便衣。他们不时向中国大使馆张望。更严重的是,凌晨两点,隔壁也开始凿墙。凌晨三点,双方的锤凿声已越来越清晰。局势已经刻不容缓,凿墙的外交人员,不顾天气寒冷,拼命抢进度,使出了全身力气,要抢在敌人之前把窃听器拿到手。眼看墙壁快要凿通,只听得啪一声,一个小方盒露出来,被我方人员一把抓住。后来,保加利亚方面特意派人来使馆“参观”,但毫无收获。尽管如此,使馆里出现“施工”比赛,还是让人后怕。

(摘自《北京晚报》9.13 王绥翔/文)

窃听器打进我使馆墙壁